

蒙古语文研究参考资料

ᠮᠤᠩᠭᠤᠯ ᠤᠯᠤᠰ ᠠᠨ ᠤᠨᠢ ᠵᠢᠨᠠᠨ ᠠᠨᠠᠨ ᠠᠨᠠᠨ ᠠᠨᠠᠨ ᠠᠨᠠᠨ ᠠᠨᠠᠨ

第 5 辑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

1981年6月

编者说明

《蒙古语文研究参考资料》是不定期的内部刊物，主要汇编和翻译刊登国外有关蒙古语言文字（包括语音、语法、词汇、方言土语、语言史、文字史、蒙古语族诸语言等）的研究情况和学术论文，同时也注意反映同蒙古语文有关的其它某些语文的研究情况。

我们译载的目的主要是给有关单位和从事蒙古语文研究工作的同志提供一些了解情况的参考资料，以利于更好地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评论。本刊一般按原文译载，不——予以评论，因此要求读者阅读时用正确的观点、方法进行分析并注意保存，不要公开引用。

由于缺乏经验，水平有限，本刊定有不少缺点错误，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资料室

目 录

关于喀尔喀方言的重音·····	Ж. 曹洛 (1)
古蒙语词干末尾辅音的一个特点·····	И.И. 泽登查波夫 (2)
蒙语中的助动词·····	P. 阿尔托 (5)
关于俄语和蒙语中的时的特点问题·····	C. 加勒森 (10)
蒙语中数的语法范畴·····	Y. 仁钦 (15)
蒙古语动词附加成分的添加次序·····	小泽重男 (18)
词汇发展的演变理论问题·····	A. 洛布桑登 德布 (25)
关于1730年版的施特拉伦堡的卡尔梅克词汇表·····	J. R. 克鲁格 (31)
关于蒙语中对偶词和重叠的分解·····	A. A. 达尔别叶娃 (34)
喀尔喀方言中的土语和次土语的分类问题·····	Э. 旺堆 (38)
维吾尔文和蒙文的关系·····	P. 茨麦 (43)
蒙语亲属关系用语的若干问题·····	C. 卡卢任斯基 (46)
蒙文《丹珠尔》的底页诗·····	Д. 策伦索德诺木 (49)
《黄金史》语言的某些语法特点·····	M. H. 奥尔洛夫斯卡娅 (53)
《元史》的蒙文翻译·····	Ch. 达赖 (58)
《元朝秘史》的“古温”一词·····	服部四郎 (60)
《蒙古秘史》作者语言考·····	П. Д. 沙格达洛夫 (64)
却吉斡斯尔是否曾翻译《五部大乘经》为蒙文? ·····	K. 沙加斯脱 (70)
关于萨查·班迪达·贡嘎扎拉僧《心鉴》一书中的wa, we·····	Д. 土穆尔陶高 (82)
蒙古帝国时代政府的牌子“套”或牌子匣·····	O. 拉铁摩尔 (85)
蒙古古突厥文文献新的研究与古文碑铭的刊印方法·····	Э. 特雷雅尔斯基 (86)
布古特的粟特碑铭·····	B. A. 利福什茨 (91)
阿富汗的蒙古人·····	S. 霍马姆 (98)

关于满洲书面语中的一些蒙语词.....	Л. 米希格 (109)
与蒙语及吉尔吉斯语对照之下显示出的伊塞克湖撒尔特卡尔梅克	
(卫拉特) 人的土语的某些语言特点.....	Ш. 董都科夫 (112)
谈谈撒拉语中的蒙语借词.....	V. 德林巴 (118)
沃舍梯史诗《纳尔特》中起源于蒙古语的名字.....	T. A. 古利叶夫 (121)
南西伯利亚突厥语中的蒙语借词	B. И. 拉萨丁 (126)
蒙古语与保加爾語的对应现象.....	Ц. 塔费拉吉斯卡 (129)
关于蒙古文化史的研究.....	Ш. 毕拉 (134)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语文研究.....	П. 霍尔洛 (139)
布里亚特的蒙古学研究.....	Д. Д. 普布桑诺夫 P. E. 普巴叶夫 (143)
蒙古学的一个分支卡尔梅克学的发展.....	И. К. 伊利什金 (145)
第二语言的学习——语言心理法.....	D. 普里查特 (151)

关于喀尔喀方言的重音

Ж. 曹洛 著

蒙古学家们都非常注意蒙古语的重音。但是他们的观点却很不一致。在蒙古语重音问题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鲍勃罗甫尼科夫、奥尔洛夫、波兹德涅耶夫等蒙古学家认为蒙古语的重音在词的末音节，而兰司铁、符拉基米尔佐夫、桑席耶夫、洛布桑旺丹、帕格巴却认为它落在词的第一音节，其根据是喀尔喀方言词的第一音节的元音比非第一音节的元音听起来清楚和有力，除去长元音和复元音，处于非第一音节的元音要弱化甚至消失。因此他们认为蒙古语的重音是着力重音，并根据其排列情况将它们分为主重音和次重音两种。喀尔喀方言的次重音基本上位于第二音节的长元音上。

再让我们概括地看一下蒙古学家鲍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鲍培也认为蒙古语的重音是力重音。同时他认为非第一音节为短元音的词中，重音要落在第一音节，第一音节为短元音，第二或第三音节为长元音的词中，重音落在长元音上；第一音节为短元音，第二和第三或第四音节为长元音的词中其重音落在第一个长元音上。在研究蒙古语的词重音时他注意到了元音的长短，他将复元音也视为长元音。

下面，让我们简单叙述一下关于喀尔喀方言的重音的实验。

我们必须首先研究第一音节的短元音和非第一音节的长元音及复元音的发音强度。

让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的某些结论。在喀尔喀方言的诸如 AB, ABAB, AM, AMAP, AT, ATAP, EMEP XƏTƏP, YTƏP等词中，处于第一音节的短元音比处于非第一音节的短元音发音紧张，声带摆动的幅度大。

我们比较研究了中部和东部喀尔喀方言、巴雅特方言及喀尔喀化的扎哈沁方言。

在所有上述方言中，硬元音A、O、Y在第一音节时其发音强度为30—33分贝，在其余音节时为27—30分贝。软元音在第一音节时其发音强度为23—29分贝，在其余音节时为19—21分贝。无论是硬元音，还是软元音，当它们处于第一音节时，其发音比其余音节强2—3分贝。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说在喀尔喀方言里第一音节硬短元音和软短元音的发音比其余非第一音节的硬元音和软元音强得多。但是，如果第一音节是短元音，而后续音节是长元音或复元音的话，那么，后续音节中的元音的发音比第一音节的元音强得多。例如书面语的 ИБЭЭЛ一词中的 И 在现代巴雅特方言的发音强度为19—20分贝，而后续音节的元音 Э 则为35—38分贝；АМААР一词中 А 的发音强度为31—33分贝之间，而后续音节的长元音 А 则在34—36分贝之间。如果以西部喀尔喀方言 АБААЛ一词为例，那么，第一音节的 А 发音强度为30—32分贝，后续音节的长元音 А 的发音强度为33—35分贝。

因此，第一音节的硬元音和软元音的发音强度不如后续音节的长元音或复元音。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首先，它同下述情形有关，即在通常发出硬元音时发音器官紧张到34—45分贝，而在发软元音时到29—45分贝。但这不是基本测定，因为我们只考察了一些诸如 АВААД, ИВЭЭЛ, АМААР, ҮЛЭЭХ等词中的硬元音和软元音。其次，它和元音发音的长短有关。在发出长元音时所需的时间显然比发短元音时所需的时间长。因此，声带振动的次数也多。同时，第二音节的长元音的发音比后续音节的长元音有力得多。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在现代喀尔喀方言里，音调重音不一定在表示疑问、惊奇、命令以及带有声音高低的其它感情表现中出现于词末。

本来，蒙古语除了着力重音之外还有音调重音，它可以由于所表达的感情色彩的不同而落在词的任何一个音节上。以喀尔喀方言的音节结构为例，它有：短元音+辅音+短元音、短元音+辅音+长元音、短元音+辅音+长元音+辅音+长元音。在这里经过语音分析，我们将得到相应的强和弱或者强音节。如果我们划出一些强音节并将主重音置于最强的音节上，那么，我们将得出两个重音：着力重音及着力重音和音调重音的汇合体。

在喀尔喀方言里，着力重音落在第一音节，而借助着力和音调因素汇合而成的重音的强度不如第一音节的着力重音。

应当指出的是，同蒙古语有亲属关系的古突厥语里第一音节的着力重音由于转移而改变了它原来的位置而被置于词末了。著名的东方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院士指出过，蒙古语保存了古老的原始阿尔泰语曾有过的着力重音。

蒙古语的元音和谐规则同重音有直接的关系。这证明在蒙古语词中，带有较强重音的元音可以同带有较弱重音的元音同化。

М. 恩和巴图译自《第二届国际蒙古学会议文集》第二册，251页

（原文作者和题目：Ж.Цолоо ОБ УДАРЕНИИ В ХАЛХАСКОМ НАРЕЧИИ）

古蒙语词干末尾辅音的一个特点

Ш.Н.泽登查波夫 著

十九世纪初，蒙古语文学家丹增达格瓦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古蒙语的某些辅音可以用于词干之末，而有一些则不见于这个位置上^①。

后来，这个问题在蒙古学著作中，例如在阿格旺丹达尔勒哈兰巴^②，鲍勃罗甫尼科夫^③

① jirūken tohta-yin tayilburi üsüg-ün endegürel-ün qarangqui-yi arilyayči oytar-xui-yin mani kemekü sudur orusibai（被称为“祈天消灭愚昧”的著作《心动脉》注释）。

② Mongyol üsüg-ün yosun-u sayitur nomlaysan kelen-ü čimeg kemegdekü orusiba（被称为《语言的润色》的被研究得很好的蒙文规则）

③ 鲍勃罗甫尼科夫，《卡尔梅克蒙古语语法》，喀山，1849年，第12—17页。

符拉基米尔佐夫^④等人的研究中，得到了阐明。

本文所要考查的这些末尾辅音的一个特点，曾经对有着共同起源的很多古突厥和古蒙古词的变体的形态差别的出现发生过影响。

我们举一些例子^⑤。

古突厥语	古蒙古语	意 义
kök	köke	“兰，青”
ärk	erke	“力，权力”
ürk	ürgü	“吓唬一下”
bark	berke	“困难的”
qat	qata	“变干”
büt	bütü	“执行”
at	adayun	“马”
tört	dörben	“四”
küč	küčü	“力”
sač	saču	“撒开”
quč	quči	“掩盖”
quš	qun	“天鹅”
tuš	tusa	“帮助”
toš	tošing	“冰锥”
jaš	jalayu	“年轻的”
saq	saki	“防卫”
čoq	soki	“打”
barq	baray-a	“家具，东西”
caq	čay	“时”
köküs	kökü	“（人）乳房”
omus	omuru	“（马）乳房”
tus	tösüge	“形，像”
bos	boru	“灰的”
öküs	üker	“牛”
bars	bar	“虎”

上列古突厥语和古蒙古语的并行词，其意义几乎相同，但在其语音结构上却不完全相同，而其形态上的差异在于以下一些征状。

第一，古突厥成分的末尾辅音，在其古蒙古语的对比中，呈现为另外的音或音组。例如，

④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列宁格勒，1929年，第408页。

⑤ 所引用的例子系抄自纳德里亚叶夫，纳西洛夫，帖尼舍夫和谢尔巴编的《古突厥语词典》（列宁格勒，1969年）和Mongğol kelen-ü tobči tayılburı tolı（泽维勒编《蒙古语简释词典》，乌兰巴托，1966年）。

古突厥语 öküš 古蒙语 üker, 古突厥语 quš, 古蒙语 qun, 古突厥语 bos, 古蒙语 boru。

第二, 古蒙语的变体具有较古突厥语为长的形式。例如, 古蒙语 tosing, 古突厥语 tos, 古蒙语 qata, 古突厥语 qat; 古蒙语 küčü, 古突厥语 küč。

第三, 古突厥变体有较古蒙语为长的形式。例如, 古突厥语 köküš, 古蒙语 kökü, 古突厥语 bars, 古蒙语 bar。

由此可以看出, 古突厥语 öküš 与古蒙语 üker, 古突厥语 qus 和古蒙语 qun, 以及古突厥语 bos 和古蒙语 boru 的末尾辅音的上述的歧异的形成, 不是由于组合性音变的结果, 因为辅音 s, r 和 š, n 的正规的交替, 不是这两种语言的特点。其余的上述的这些词在构词或词形变化过程中的形态变化, 也是如此, 因为它们是在它们所表示的意义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变化的, 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词汇学上不可分解的原始词干, 即其中不可能分出词根和附加成分。

这时应当注意到这一事实, 即所有的古突厥语成分的词干都是以辅音 k, t, č, š, q 和 s 结尾的, 而在其古蒙语变体的末尾则用另一些音。这是因为, 古蒙语不同于古突厥语, 在词干之末, 没有辅音 t, č, q 和 š, s 音虽可在这一位置上, 但也甚为罕见^⑥。上述辅音的存在于一种语言的词干之末, 而不存在于另一种语言的词干之末, 这不是个别的例子如此, 而是涉及于整整一系列的词汇单位。因此, 这些特殊性构成了古突厥语和古蒙语的一个特点。正是由于在其中的每一种语中出现这些不同的发展趋势的结果, 才可能发生以类比的方法, 即以对这两种语言的末尾辅音的各种变体各自所使用的结尾形式加以考察的古突厥语变体的形态差异。

除此而外, 类似的由于古蒙语末尾辅音的特点而引起的词干结尾的改变的可能性, 可以用一个稍为明显一些的实际证据来加以证实。例如, 外语的词汇单位, 在其转入古蒙语之时, 要受到类似的词形变化。特别是维吾尔语的 čerik “军队” 和 prit “饿鬼”, 在借入古蒙语时, 就由于其末尾辅音 k 和 t 为 g 和 d 音所代替的结果而变成了 čerig 和 birid, 而维吾尔语的 kilinče 则由于在古蒙语中元音 “e” 的形式的延长而成为了 kilinče “罪”。

这里所举的维吾尔语例子的末尾辅音 k, t 和 č, 均不用于古蒙语音节之末。因此, 由于这一现象的制约, 这些维吾尔词经过上述的变化进入古蒙语词汇中时, 去掉了自己的词干末尾辅音。

其次, 在古蒙语中, 在音节之末, 因而也在词干的末尾, 存在着 s, d 音的交替, 例如, ebes ebed “患病”; emgenis emgenid “忧愁”。^⑦

我们知道, 辅音 s 在古蒙语词干之末甚为罕见。以此之故, 与此现象相类似, 在古蒙语中存在过一种在词末不用辅音 s 而以 d 音代之的发展方向, 是完全可能的。因此, 古蒙语词干末尾辅音 s, d 的交替, 反映出词的由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过渡的不稳定的状态。

此外, 还应当指出, 在现代布里亚特语中, 与古蒙语不同, 辅音 s 在词末要更为罕见得多。因此, 在布里亚特语中, 在词末位置上避开它, 而用 d 音以代之的倾向, 表现得最为充分。例如, 古蒙语 qayas, 布里亚特语 qaqad “半”; 古蒙语 büs, 布里亚特语 būd “布”。

⑥ 古代蒙古语词干末最常用的是它的全部元音和辅音 n, ŋ, b, γ, r, g, m, l, b。

⑦ 所举带有这种交替的词的例子, 系取自符拉基米尔佐夫, 《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列宁格勒, 1929年第396页) 和, Mongγol kelen-ü tayilburi toli。

古蒙语 *alas*, 布里亚特语 *alad* “逆”; 古蒙语 *ulus*, 布里亚特语 *ulud* “人民”; 古蒙语 *oros*, 布里亚特语 *orod* “俄国的”。⑧

因此, 最后必须指出, 以上所举出的一些成对的词, 在其词尾含有形态的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古蒙语与古突厥语的词末辅音不一致而以类推的方式构成的。类似的词形变化就构成古蒙语的一个特点。

周建奇译自《第二届国际蒙古学会议文集》, 第二册, 280页

(原文的作者与题目: Ш.Н.Цыденов, ОБ ОДНОЙ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КОНЕЧНЫХ СОГЛАСНЫХ ОСНОВЫ СЛОВ СТАРО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ЯЗЫКА)

蒙语中的助动词

P. 阿尔托 著

在一些最古老的碑文上, 我们发现蒙语中有些词语, 在主要动词的名词形式或副词形式的后面, 有一个“定式”的助动词。这类组合表明主要动词动作的“宾语”体或(以及)

“主语”体。宾语体在德语中叫“Aktionsart”某些动词有自己的宾语体, 这种宾语体或是延续体, 或是准时完成体, 视其原意而定。其它动词则可用于各种体。这些体在不同语言中以不同形式表现。例如, 在几种印欧语言中是通过在动词词干加各种前缀来进行的①。梵文的蒙文译本表明梵文的动词前缀一般变为蒙语的助动词。例如: *pra-iksante = qara ju* *°rošibai* ①a.

“主语体”可解释作与, 例如, 动作主体的作用, 即无论它是替自己作的, 还是为别人作的, 有关的体。印欧语中的主动和中动态是区别这些体的一种方法。蒙语中为此目的使用的助动词常称作“描写动词”②。

秘史与根据秘史写的较新的历史著作的语言的比较, 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助动词使用沿革的有价值资料。在现代蒙语中某些古老的助动词已降格为后缀。这是解释印欧语言某些动词形式的假说的有趣的确证。

蒙语有两个异于交替动词“是”, 即 *a-*和 *bü-*用来表示主要动词延续体: 这些表现法近乎

⑧ 所举例子系录自切列米索夫的《布里亚特蒙俄词典》(莫斯科, 1951年)和 *MongYol kelen-ü tobči tayilburi toli*《蒙语简释词典》, 泽维勒编, 乌兰巴托, 1966年。

① 参看 Jens Høft 的 *Etudes d' aspect (= Acta Jutlandica 15)*, Aarhus 1943

①a. 见 Friedrich Weller, “Sanskritische Präpositionen im Spiegel mongolischer Übersetzung.” (中亚杂志, VII, 海牙, 1963, 1—26页)

② 蒙语助动词和描写性的动词在 G. D. Sandzeiev 的实例中论述, 见 (*Sravnitel'naja grammatika mongol'skix jazikov. Glagol.* 莫斯科 1963年, 67—71页;

以及 N. Poppe 的 (*Khalkha-mongolische Grammatik*, 威斯巴登 1951年, 89—91页)

英语的扩展时态。这样，在情态副动词后面有 a-：MNT③52 qamuy mongyol-i qabul qayan meden aba = ATN...meden yabuba；MNT 90 ge'ü sa'an aqu-yi jolayaju = ATN sayan büküi-dür jolayaju；MNT 185 uruy-un uruy-a kürtele öneçid-ün abliy-a abun atuyai (= 217, 在218中只有 abtuyai) 在表达 MNT 209 usun-i nitulun abai je ta 时 ATN 把这个助动词当作了 ögbei；后者表示一种为别人而进行的动作。

从较古老的史料中，现在时 amu 似乎出现在未完成副动词之后。同样的词形用在情态副动词的后面似乎产生了后来的以 -nam 结尾的现在时，而以 -nā 结尾的现在时则要追溯到情态副动词加 ayu。甚至在一个未完成副动词之后，助动词 a- 也用来表示一种情况，作为发生的事情的背景：MNT89 nutuyaju aqui-dur = ATN nutuyaju büküi dur；MNT 99 herüjü aju üjejü bayasha。田清波 (Mostaert) 和克里弗斯 (Cleaves) 把德黑兰文书中的 bariju ayai...jarliq 这种说法译成“要收执的文书”。我认为在八思巴的表现法中可以找出同样含义的短语 bariju yabu'ayi jarliq，因为上面所摘的 MNT 52 和 ATN52 的句子中表明，a- 和 yabu- 在表现持续体时是同义词语。

很久以来，动词 bü 似乎就补充了 a- 的词形变化表中所缺少的某些形式。此外，似乎有一种以 bü- 代替 a- 的趋势，甚至在别种例子里也是这样。我们发现了有趣的，类似情况，如，在 MNT 4 duwa soqor...yurban ne'urit yajar-a qaraqū büle'e = AT ④ yurban negüri yajar-a üjen bülüge = ATN...üjekü ajuyu；以及 MNT 147 ken qarbul'a ? = ATN qarbuysan ken bülüge？因此，bü 的现在完成时与主要动词的未来名词的结合，表示一个经常的反复动作，如：MNT21 sünid büri...gegeyen inu ke'eli-dür minu singgegü büle'e...yarqu büle'e，MNT85 ger-ün belge, sün tösürü'et esüg-iyen süni-de ödür çayitala bülükü büle'e。上述结构在假定句中的条件副动词后，可以在结果分句中表示不现实。在假定句中，经常可以在主要动词的完成名词后面遇到助动词的条件副动词。在情态副动词后面，这个助动词似乎表示一个持续动作，而在未完成副动词后面表示完成动词的动作所产生的情况：MNT98 bürgi-de bao'uju büküi-dür nigen manayar erte...ödür geyin büküi-dür；在梵文的译文中，例如：AG ⑤ butaraju bükü-yi üjejü = vikirñām dṛstvā。主要动词的未完成副动词后面的准备副动词又表达梵文的一种绝对式。AG bariju бүрүн = gṛhītā, takiju бүрүн = pūjāp kṛtvā 在主要动词的完成副动词后面的这种形式也表示让步。

现在时 bui 和上述词干 bü- 相结合成为助动词，例如喀尔喀语和鄂尔多斯语就是这样：jawudzi bi (他正在走)。动词 bayi- (将是，留下) 也出现在情态副动词后面，表达一种持续的意味：MNT146 qayilan uyilan bayiqu-yi sonosçu。在故事中常被理解为历史现在时，例如 MNT121 širo, ai sačun sačun baiyimu。在现代喀尔喀语中，这个动词在否定词形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卡尔梅克语中，而且还可能在蒙古语中，在连接音变中丧

③ MNT = Monšhol un niuca Tobca'an, ed. by Haenisch. 来比锡, 1937年。

ATN = The Altan Tobči (黄金史)，根据 S.A. Kozin, Sokrovennoje skazaniye I,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41年, 321页。

④ AT = 蒙古黄金史 C.R. Bawden 译, 威斯巴登, 1935年。

⑤ AG = Altan Gerel, Suvarnaprabhasasuttra 的蒙译。

失了首音，例如：卡尔梅克语的 *tsändž-adž*（正在沸腾）。

一个展望的意味似乎通过主要动词的未来名词后面的助动词 *bol-* 表现出来，MNT241 *tümet-irgen-ü ökit abqu keyen odqu bolun*。这个助动词的使用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常见这个助动词常作同句中的主要动词。从最早的记录直到现代蒙语中，*bol-* 的使用是最有意思的了^⑥。显然值得特别研究，因为它为几种其它语言（包括芬兰语）的习惯表现法提供了比较。

和现代拉丁语系语言及英语一样，蒙语也使用动词 *yabu-*（走）来表示主要动词未完成体。它的发展成为这类助动词仍可由下面例子中看出，象 MNT15 *yabuju yabumu = ATN yadaju yabun amu bi*。可在 MNT110 中发现几个这种结构的例子。在这些结构中，感觉动词的持续性是特别明显的。田清波把 MNT205 *sedkijü yabuju bi* 译成“继续思索”把 MNT209 *bi mao'uila ju yabu ju* 译成“当我对他不满意时”。在包括情态副动词的结构里，与包括主要动词未完成副动词的结构里的细微差别并不是总是易于分辨的。例如海涅什(Haenisch)将 MNT170 *anda-dur bi qatquldun yadan yabulu 'a* 译成“我早已就决不可能与朋友作战了”。这个助动词似乎越来越普遍地见诸文字资料。在现代语言中也是这样，虽然在诸如“睡眠”的动词方面，例如卡尔梅克语使用动词 *kepte-*“躺下”作为粗略延续体的助动词。

甚至在 MNT 中我们会碰到 *sayu-*（坐下，住），在其中，它似乎起着持续体助动词的作用。参见作者的论文“蒙语尾重句结构”，1970 年蒙语研究杂志，第十六页，布达佩斯出版。在现代鄂尔多斯语中，例如 *tšugidži sū-*“不断地争吵”，还可参见斯麦特—田清波著《蒙古尔语方言》第十一章语法部分，第一三四页，一九四五年北京版。

典型的蒙语结构是将主要动词的情态副动词和 *ile-*（送）联用来表示送的目的。通过未完成副动词也表示同样的含义。例如 MNT127 *ügüleju ilerün*（派去说），在拉丁语和拉丁语系语言中，有极类似的，*diceudo mittere~mandare* ^⑦ 等。在某些例子中，动词 *ile* 似乎有完成体的作用，参见 MNT140 *belgütei...niru'u inu ebüdüglejü ququļu ilebe, büri bökö...üküju ilebe = ANT niruyn inu öbüdüglejü alaba, b...ükübe*。人们可能会期望，特别是在不及物动词“死”这个例子里，完成体将会借助于动词 *od-*（去）的帮助来表达。我们遇到过这类的例子，MNT91 *naran singgekü odba = ATN naran singgeju odba*，参照终止完成说法 *ñi ma nub son*（太阳落山了）这种藏文说法^⑧。在现代语言中，诸如卡尔梅克语就是这样，不及物动词的完成体是通过在未完成副动词后面的 *od-* 来表达的。*üküdž odw*（死掉），*nadadž odw*（贴在一起），*soktäd untäd odnā*（醉后入睡）。

yorči（走开）似乎也以 *yar-*（走出）式的助动词的作用出现在某些表现法中。甚至 *talbi-*（释放）也当作完成助动词来使用，例如，MNT32 *onan müren ö'ede qataraju yorči ju talbiba = ANT...qarin qataribasū*，类似的说法也出现在现代语言中，例如鄂尔多斯语 *keledži tawi-*（事先说出）。

当然，延续动词的终止完成体应以使用象 *bara-*（完结、死去）这样的助动词来表示。参见 MNT75 *eres sayid balun bara'asu*，MNT146 *ödür geyin bara'asu*。例如在鄂尔多

⑥ 见 Poppe I.c.P.90.

⑦ 见 Pentti Aalto,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lateinische Gerundium und Gerundium, 赫尔辛基 1949 年, 76—78 页有深入的解释。

⑧ 见 Jacques Bacot, Grammaire du tibetain littéraire II, 巴黎 1948 年, 134 页。

斯语中 bara- 仍这样使用。直得指出的是在蒙古尔语中, 同义动词 ala- (杀) 用作助动词来表示一个终止加强体, 但只和表示不愉快感情的动词搭配使用。

特别是在表示动作的动词后, ire- (来) 似乎表示终止完成体, 例如 MNT32 ayisun buyu. gürčü irebesü = ATN ayisun irebesü, 以及 MNT 57... nereyidčü iregse'er... ATN nereyidčusen ber. 情态副动词似乎又表示来的目的: MNT120 neyilen irebe (来参加)。

现代语言使用动词 orki- (扔) 作为完成助动词, 例如 aladži orxi- (杀)。在卡尔梅克语中, 在这个位置的动词已经降为一个派生后缀, 例如 altškād (杀死了), utskāw (喝光), xulxālad awād oknā (偷走)。秘史中有动词 o'or- “扔”, 我认为这有同样作用。尽管海涅什 (Haenisch) 总是照字面来译, 参见 MNT19 niži'eli ya'u baiyi'ulqun ququčiju o'orba。在同义动词 ge- 中也能见到同样的含义, 例如 MNT11 abaya-yu'an uruy-a ülü bolyan doramjilažu qayažu gežu nōü'übe, 在该处 ATN 在正文中写上了 orkiyad 当作注释词... qayažu (orkiyad) negübe。

主要动词的未完成副动词与动词 ayisu- (接近) 的一种形式搭配, 表示所指的动作一直在进行了一些时候, 现已接近完成。一般来说, 主要动词是表示动作的动词, 可是也发现在 MNT 91 naran šinggežu odba.dü'üşin bolju ayisu, 这里 ATN 省略了 ayisu。一个有趣的例子是 MNT94 e'üsgeŋ ayisurun 这里 ATN 将 egüsken ayisutun 和注释词 ireküi-dür 连用, 可是在 AT20 中, 却用 egürken abču ireküi-dür。在鄂尔多斯语中发现有更高高度发展的例子, 例如 ene döl ojordži äsui boldži (这张羊羔皮差不多快缝完了)。

动词 ab- (拿) 在古语中常累赘地出现在其它有关“拿”这类动词上, 例如 MNT 80 bariju abču odba = ATN bariju abuyad odču。后来这个动词用来描述为主语完成的行为, 在现代语言中仍复如此。不过尽管它似乎把这个行为描述成完成的动作, 但我以为此完成体比里森 (Lessing) 所强调的瞬时性更为重要^⑨, 参见例如卡尔梅克语 surdž aw- (学习), olād aw (发现), 鄂尔多斯语 bi uge keledži batar tere kün džabsarāsan awāt kelele, “我讲话时, 那个人把我的话打断了说...” 同义词 bari (拿) 也可以用于同样的职能, 例如鄂尔多斯语 daxidži dürsü awxudu südži baridži wādži awxulij “当人家要我再拍一张照片时, 我坐在那儿让人家拍照。”

很自然, 为主语以外的任何人而完成的行为是由动词 ög (给) 来描述的。参见 MNT 200 mun jamuqa-yin ile imayi yadaysan haran-i mökör'i'üljü ögbe, 或 209 güčütü-yin güjü'ün bökö-yin böge daruju ögbe je či 在现代语言中, 也出现于实际上的“给”不可能的例子。例如在鄂尔多斯语中 bi üde nēgād ögöj (我将开门) 这个助动词同时有一个完成值, 因为一个动作在能够被“给”人以前, 必须被完成。

主语的因果关系和完结是由动词 ke- (说) 当作助动词来表现的: 它形成一种直接引语来表达主语的想法, 例如 MNT23 bodončar-a mungqay yadao'u buiyi keyen uruy-a ülü to'an qubi ese ögbe 由海涅什译成“由于他的愚蠢和软弱...”。在卡尔梅克语中, 有诸如 aln gew (他要杀), jown gedz wätl (当他正要走时) 的例子。有几个关于这个动词的模范用法的好例子都被田清波在他的词典中援引了。(第二五三页以下)^⑩。在一项有趣的研究

^⑨ F. Lessing, 蒙英词典, 波克里, 1960年2页。

中, A. 魏利和 C. H. 阿姆布鲁斯特指出了在中文和非洲的哈姆语中动词“说”的十分相似的用法。尽管蒙语和汉语在这方面表现方法相同, 没有必要把它看作是汉语对蒙语的影响。

典型的蒙语助动词的有趣的例子还有表示客气的助动词。这方面可不必探索。

尽管有可能使用前缀, 可是就连印欧语也使用助动词来表现体貌。例如, 在梵文中有助动词象 as-~bhū- (将是), as- (坐) (dhārayann āste 他正拿着), sthā- (站), vart- (呆着、留下), vas (住), kar (作), car-~i-~gam (走) (āvestitāni caranti 正在被包围, mṛdyamānāni yanti 正在被征服。)等^⑪。古伊朗人使用相应的 ah- (将是)和 āh- (坐), 例如: yez ahi garō dərətəm (当你住在山上时)^⑫。

在印地语和其它现代印度雅利安语中, 类似的动词表示粗略持续体^⑬。这些语言里可能有某些达罗毗荼语的影响, 因为这类的表现法在达罗毗荼语中是很正常的^⑭, 例如泰卢固语 pani cedi pōtunnadi (此事正在衰落) (pō- “去”), ātlu ceyucu vaccinām (我已经是这么作的) > (我已一贯习惯于这样作); 在冈地语中 rohci simt 是以和蒙语的 ilejū ög-a 的同样方式构成的, 以含语的 kafa te ime 也可引出一种类似的说法^⑮。

拉丁语的 esse (是), stare (站), ire~vadere~ambulare (去)是和离格动名词一起使用的, 而且, 这些结构后来在拉丁语系语言中发展起来, 例如古西班牙语 era escribiendo e contande (他在和算)^⑯。英语对这种扩展时态的运用是很有名的, 例如 he is hunting (他正在打猎) ~ he goes hunting (他去打猎)^⑰。

可是甚至在拉丁语中, 未完成式 -bam 以及未来式 -bo 是能追溯到原始的此动词的静词形式和助动词 bhu- (是)的组合的。拉丁文 amabam 等等的原始的意思是“过去我正在爱”。一旦采用了正常未完成时的功能, 就要形成一个新的延续动词 amans eram~。

我们明确地知道拉丁语系的未来时采用起源于一种类似的方式: 拉丁语 amare habeo > 法语 aimerai。还曾经被认为在闪语和含语中由三个根本字母组成的动词词根起源于两个原来独立的词根的结合^⑱。

⑪ 发表于东方研究学刊 VII, 伦敦 1933—1935 年, 573 页。

⑫ 见 B. Delbrück, Vergleichende Syntax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III, 斯拉斯 1900 年 12 页; Altindische Syntax, Halle 1888 年, 390 页以及 J. S. Speijer, Sanskrit Syntax, 莱顿 1886, 298 页和 Louis Renou, Grammaire sanscrite, 巴黎 1961 年, 494 页。

⑬ 参见 Hans Reichelt, Awestisches Elementarbuch, 海德堡 1967 年, 622—627 页, 及 671 页。

⑭ 见 Jules Bloch, Indo-Aryan from the Vedas to Modern Times, 巴黎 1965 年, 282, 287 页, 还有 Paul Hacker, Zur Funktion einiger Hilfsverba im modernen Hindi (= Ab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Literatur, 1958, 4) 以及 V. Porizka, “Notes on R. V. Vales Theory of Verbal Composition of the Hindi, Bengālī, Gujarātī and Marāṭh”, Archiv Orientalni XII, 布拉格 1958 年 144 页。

⑮ 见 Jules Bloch, Dravidian 语言语法结构, 波那 1954 年, 92 页。

⑯ 见 Carl Meinhof, Die Entstehung flektierender Sprachen, 柏林 1936 年, 94 页。

⑰ 查阅我在 Fn, 7 前的研究。

⑱ 见 Otto Jespersen The Expanded Tenses (= Society for pure English Tract Nr XXXVI, 伦敦 1931 年, 524 页)。

⑲ 见 Meinhof I. c.,

正如吉武(?)^{①②}指出,使用助动词来表示动词的宾语体和主语体,见于土耳其语、通古斯语、朝鲜语和日语。这种和蒙语的相近似,当然可视为所有这些语言同源的证据。另一方面这种方法,被用于那么多不能视作都来自一个共同祖先的语言,所以可以说是语言学上的一种“普遍现象”。似乎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有象蒙语那么多的助动词和主要动词形式合用,并起那么多的不同作用^③。凡对这种语言学上的普遍现象有兴趣者都应当熟悉助动词的蒙语用法。

张乃俊译自《第二届国际蒙古学会议文集》第一册,34页

(原文的作者和题目为:P. Aalto, AUXILIARY VERBS IN MONGOLIAN)

关于俄语和蒙语中的时的特点问题

C. 加勒桑 著

在现代语言学著作中,一个复杂而又有争论的问题是时的语法范畴。几乎在各种语言体系的所有语法中,通常都按三种基本型式,将时的语法概念加以分类。

本文作者对三种语法的时的传统分类表示怀疑。

× × ×

古典的语言学思想的代表,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道纳特就已经注意到了动词性质的各种特点及其时的形态,因此,动词的三种时的语法概念的传统分类,起源于古典的语言学思想,这不仅在西方语言文献中,而且也在东方国家的语文学著作有其反映。

在现代语言学理论中,研究者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描绘时的范畴。例如,著名的丹麦语言学家奥托·耶斯裴生在他的《语法哲学》一书中,与实际的时联系起来,考察了时的范畴。在他的理论视域里,不仅有作为时的语法表现手段的动词的时,而且也有词和构词附加成分的词义中的时的概念的表现。在我们看来,在考察语言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不容许有极端性,否则,就会抹杀语法概念和词汇概念之间的界限。我们知道,动词的时的类型:我读,我写等等,较之词汇的时的词的类型:明天,今天等等是有某种更为一般,更为普遍的性质。

在表示出语言的时的形式特点的现代语言学家们的体系中,我们认为耶斯裴生体系较为完善。^①

在我们看来,耶斯裴生的体系最真实地反映出了彼此间有着内在联系的那些动词的时的色彩的因素。

^{①②} 见 Yoshitake, “蒙语助动词”东方研究学刊V 伦敦 1928—30年523—539. 还有A. Von Gabain “Verbalkomposition im Türkischen” (Türk Dili Arastirmalari Yilligi Belleten, Ankara 1953) 以及 her Altturkische Grammatik, 来比锡 1950, passim.

^③ 当然,助动词结构的种类远比我上面列举的为多。

^① 参看耶斯裴生,《语法哲学》,莫斯科,1958年版俄译本。

但是,无论体系有多么博大,它也不可能把各种系统的语言中所有的时的意味全都网罗无遗。这种体系充其量也不过是某种具体形式的时的意义的使用的某种相对性。在蒙古学著作中,目前还很难举出有那些作者是直接研究蒙古语的时的特点问题的。在这方面,苏联的蒙古学家桑席叶夫教授的《蒙古语比较语法·动词》,1964年莫斯科版,有很大的意义。其中,有很多与蒙古语动词的性质、形动词和副动词的形式的特点,它们的使用有关的有趣的见解。

在历史上,对俄语和蒙古语中的时的特点的阐释,当然是不止一种。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在俄罗斯语文学中,认为俄语动词有8——10种不同的时。例如罗蒙诺索夫认为有10种,而沃斯科夫则认为有8种时的形式。

但是,这一观点没有被所有的语言学家所接受。有些研究者对它持怀疑态度。例如著名的研究者帕甫斯基对这个问题这样说过:“怪事!甚至连三种时的(现在、过去和将来时的)区别都还没有的俄语中,有十种时。在其中,也和在其他斯拉夫语中一样,既无将来时与现在时之分,而我们现在称为过去时的形动词也……不过是形容词而已”。①

如果以之与罗蒙诺索夫和沃斯科夫的观点比较起来,可以看到一些迥然相反的意见。在著名的学者阿克萨科夫的《论俄语动词》(1855年)这本小册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的理论观念,甚至根本否认在俄语中有时的范畴存在。他在他的著作中,完全不承认俄语中有过去时。

阿克萨科夫写道:“……在我们的语言中根本没有过去时。在我们这里,用来代替过去时动词形式的是过去形容词或形动词:代替 был 的是 бывший;代替 служил 的是 служащий”。

阿克萨科夫认为只在习惯中有类似的形式差异。

除此而外,由于未来时形式在俄语中常常被用作现在时和过去时,所以他也对它们提出了怀疑:“常常被用来表示未来的动词的形式,不能叫做未来时的形式,因为也常常被用于过去和现在”。他还说:“……在俄语动词中究竟有什么样的时呢?只有一个现在时,但是,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概念的孤另另的现在时,已经不是一种时,而是一种无限性”。②

在阿克萨科夫之后,在语言学中盛行一种忽视俄语动词体系中的一切时的形式的观点。时被认为是说话人与听话人的一个抽象的主观范畴。后来的语言学家们就百般限制起时的形式来,尽量不越出它们的三类的界限。

因此,十九世纪前半期俄罗斯语言学中时的语法范畴的概念的一个特点是态度主观,因为在这个时期里,盛行一种康德的关于时形式的学说,把时间解释成为人的意识的一个主观范畴。例如,按照著名的俄语句法学家彼什科夫斯基的观念,时间形式的基础是“语言的意识和被思维的行为的主观的相互关系”。③

我们顺便扯了一些对时的看法的历史。从上述中可以看出,对于动词的特点,在语言学家中存在着完全不同,有时甚至相反的意见。

这绝不是偶然的。语言学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各种不同意见,首先是由于任何一种语言

① 帕甫斯基,《对动词的语文学观察》,页201。

② 阿克萨科夫,《语文学文集》,第一部,页411。

③ 彼什科夫斯基《从科学观点看俄语句法》,页106—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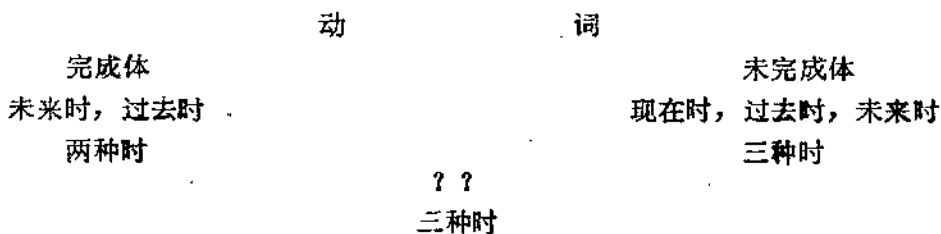
中都有的时的概念的表现的本身的特点和特性，尤其是由于在各种语言情况中时的语法形式使用的复杂性。

我们认为，在动词的时中，不仅存在着主观的方面。这个方面是绝对存在的。但动词的时，大部分反映着人的语言的现实和客观的方面，而这一方面也同样地重要。除此而外，既要注意到在各种语言中，特别是在我们用作比较的语言中，动词的各种时在意义上互相补充，但也不能陷入另一极端，即根本否认各种不同的时的存在。例如，俄语的现在时可以用作将来时：уезжаю через месяц（我过一个月走）。这也是蒙古语的一个特点：Чамайг маргааш ирэхэд би энд сууж байна（我要在这里等（坐）到你明天来）。сууж байна 直译为：坐着+是。但是，这样的用法，在两种语言中都是有限的。在俄语中，它较常见于运动的动词。不但如此，在“我过一个月走”这种型式的句子中，虽然在现代语言学中，通常认为是现在时形式的动词被用作将来时，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种结构是完全独立的一个类。这一类，我们称为“超时”类，即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事实的断定。这样一种在其中只有事实的断定而没有任何时间色彩的句子，是很多的。因此，俄语和蒙语中的这类结构，绝对应当把它们分为单独的一类。根据这一点，我认为有四种时的形式的类型：现在时（present）未来时（future），过去时（past）和超时。

这样的分类，我们以为更符合于所谓的双重系统。下一类型结构的各种形式：“Брат старше сестры”（哥哥比妹妹大），“Железо тверже меди”（铁比铜硬），“Земля вращается вокруг солнца”（地球绕着太阳转），“Зургаан сарын долоон”（六月七日），“Дорж өвгөн хүн”（道尔吉老人），“цасны өнгө цагаан”（雪白），“уезжаю через месяц”（我过一个月走），以及各种形式的主格结构，都可以归于第四类。在“我过一个月走”这一类型的句子中，未来的意义仅仅是通过“过一个月”这一词组来表示的，而动词——谓语只是不带任何时间含义地断言一个事实。

传统分类法（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缺点，还表现在以下一点上。在俄语中，动词分为从构成的观点看来是平等的两种体。完成体和未完成体。动词的这两个种类都是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开的一部分。但是，用一部分可以构成“三种时”，而用另一部分，只能构成“两种”。请问，在用大半动词只能构成两种时的时候，我们根据什么有权谈论三种时。

如果用图形表示出来，那就是这样：



除此而外，如果从语言使用的观点来对待时的范畴，那么，它就显得是极其相对的。例如，每一段时间，就其本身而言，都可以作为现在，未来，过去或超时的说话的时刻，只要我们从不同的观点对待它。“我在读”，这绝对是现在时的事实。如果与“我明天将要读”相比较，那么，就是将来时的事实。如果着眼于读是我的一项经常的工作，那么，这就是一件有关时间的事实。换言之，没有现在或将来，也就没有过去。同样如果没有过去或

现在，也就谈不上将来。因此，时的概念也和人的生活中的一切概念一样，是很相对的，在时的各种形式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

在两种语言中，我们都见到有很多时间性质的细微差异。但这样一些细微差异，当然不能称为是一些独立的时的形式，但可惜，有时这是被容许了的。有时可能显得，并非所有的时的细小差异都可进入某种分类范围。但是，这不必耽心，因为从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看来，并不是所有的个别都可以进入一般。这就是辩证法的真理。最主要的，需要经常注意的，不是语法现象和事实的量的方面，而是现实的语言的使用。为说明这一原理，我们举出下面一个例子：在蒙古学中，通常认为，在现代蒙古语中有几种过去时。无可争辩，在过去时形式中，它离现在时——说话的时刻的为时的远近，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几“种”过去时在现代蒙古语中的存在，开创了另一种局面，譬如说，与古俄语的过去时不相同的一种局面。①

在现代蒙古语中，以上所说的几种过去时，按意义分为：远过去时，不远过去时等等。

但是，在现实的语言交谈中，这几种过去时并不是同样使用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在涉及远的过去的事件的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带有附加成分“жээ, чээ”的远过去时的蒙语动词。根据我们的观察，带有附加成分“жээ, чээ”的蒙语远过去时动词，很少与各种代词，特别是第一人称代词连用。它的使用见于两种情况：

а) 在说话人(би—我)想起了某事，某人或自己的时候：

Би сахилгагүй хүүхэд байжээ—“我曾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 Бага байхдаа би хөгжимд их дуртай байжээ—“在幼年时代我很喜欢音乐”。

б) 在指不为任何人所知而进行的行为或错误地进行的某一行为时：

Чээж бичиг бичихэд би тав алджээ—“在默写中，我显然有五个错误”。

Ном аваад явчсан хүн Дорж байжээ—“把书拿走的那个人，原来是道尔吉”。

Дорж иржээ—“原来是道尔吉来过”。(说这句话的时候，也许是在我不知道道尔吉来过的时候，或者是在道尔吉的到来对我还是一件新闻的时候)。

一句话，不是在任何一个指远的过去的行为的时候，都可以用远过去时动词。因此，如果不说现代蒙语中的什么同等独立的四种过去时的形式，而说有其各种不同色彩的一种过去时，这就恰当了。其次，另一种带有附加成分“В”的蒙语过去时，几乎不见于口语中。在口语中，只由于有疑问小词的存在，才见到它，如：Очив уу—到过吗？去过吗？等等。至于带有附加成分“лаа, лээ, лоо, лөө”的过去时，那么，恰好相反，它们不仅是口语所特有的，而且也是为书面语所特有的。从上述中可以看出，过去时的各种形式，在现代蒙语中，远不是平行的，更不用说都是成色十足的了，也不应当把它们分成各个类。如果这些动词形式，处于同一的语言线上，可以自由地互相替换，带来某种时的色彩的区别，那么，只在这时，他们才可以成为单独的类。但是，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事情远非如此。必须特别指出，对于确定某一形式的时的意义，首先需要语势。例如“Дорж явжээ”这一类型的自身包括着远过去时动词在内的简单的结构，可以用于完全不同，甚至于相反的意义上：

① 我们知道，在古俄语中有四种过去时形式：一次式，完成式，未完成式和大过去式。